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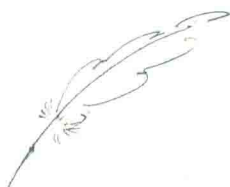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地缘政治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德]卡尔·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 ● 著

#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

Studien über di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Geographie und Geschichte

马勇 张培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地缘政治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

##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

Studien über di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Geographie und Geschichte

〔德〕卡尔·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 | 著

马勇 张培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 / (德) 卡尔·豪斯霍弗著；马勇，张培均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858-6

I. ①太… II. ①卡… ②马… ③张… III. ①地缘政治学—研究—亚太地区 IV. ①D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6185 号

审图号：GS (2019) 4393 号

---

##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

---

作 者 [德] 卡尔·豪斯霍弗  
译 者 马 勇 张培均  
责任编辑 李安琴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44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 “地缘政治学丛编”出版说明

在一种观点看来,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一门学科的两个名称,并无实质差异。<sup>①</sup>人们显然不能说,地缘政治学是德语学界的惯用术语,而政治地理学是英语和法语学界的惯用术语。19世纪末的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1846—1904)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而他为这门学科奠基的大著就名为《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1897, 715页)。1925年,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毛尔(Otto Maull, 1887—1957)出版的地缘政治学教科书也名为《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Berlin, 1956年修订版)。十年后,毛尔出版了一本同样性质的著作,却又名为《地缘政治学的本质》(*Das Wesen der Geopolitik*, 1936)。<sup>②</sup>

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这两个术语似乎可以互换,其实不然。仅仅从字面上看,这两个术语也有差异:政治地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历史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则是政治学。瑞典的契伦(1864—1922)作为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的发明者出身于政治学专

---

① 皮尔赛等,《世界政治地理》,彦屈远译,台北:世界书局,1975,页7。

② 比较 Rainer Sprengel, *Kritik der Geopolitik. Ein deutscher Diskurs. 1914-1944*, Berlin, 1996。

业,而非像拉采尔那样出生于地理学专业。契伦凭靠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原理来建构现代式的国家学说仅仅表明,自18世纪以来,政治学越来越离不开对世界地理的政治史认识。

就学科性质而言,由于综合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这个名称比“政治地理学”更恰切。毕竟,这门学问的重点在政治而非地理,地表不过是人世间政治冲突的场所。<sup>①</sup>豪斯霍弗说得有道理: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属于“政治地理学”要著,它为理解“地缘政治学”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sup>②</sup>换言之,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属下的一个基础性子学科,没有某种政治学观念的引导,政治地理学仅仅是一堆实证知识。

拉采尔逝前一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的增订版(1903),这个版本添加了一个并列的书名“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o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这个副题准确解释了拉采尔所理解的“政治”现象的含义:“诸国家”是复数,“贸易”和“战争”是单数。这意味着,“政治”就是诸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战争。

显然不能说,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定义。自有文明记载以来,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和战争就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经验。不过,古代与现代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之外,商业技术文明的出现是这种差别的决

---

<sup>①</sup> 比较 R.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 Painter, *Politics,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London, 1995。

<sup>②</sup> 豪斯霍弗,《〈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63-64。

定性原因。1750年,杜尔哥(1727—1781)写下了《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世界地缘政治史的演进图。<sup>①</sup>事实上,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中的所有基本论题,都可以在杜尔哥的这篇纲要中找到。

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的“序言”一开始就说:他的老师李特尔(Karl Ritter, 1779—1859)已经充分注意到地理学的“政治方面”。<sup>②</sup>史称李特尔为“人文地理学”的先驱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他因在其成名作《地球志》中探究了“黑非洲”而随即被当时的普鲁士王家军事学院聘为地理学教授。<sup>③</sup>由此看来,“人文地理学”这个名称虽然听起来颇为美丽,且如今已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但其诞生之初却是为欧洲各王国的世界性“政治占有”服务的自然科学。

作为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人、罗马人乃至后来的日耳曼裔欧洲人,在地缘政治冲突方面的经历都远比我们的古人丰富。周代晚期七国争霸的内战状态,毕竟并未与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流亡陪都重庆的世界史学家也成立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协会”(1941),还形成了一个“战国策派”。但因时势艰难,中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很难有沉静的心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深入认识地缘政

---

① 杜尔哥,《政治地理学》,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99—118。

② 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o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 München, 1923 (E. Oberhummer 审读、增订第三版),页V。

③ 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43。

治学。

“文革”时期关于“三个世界”的普及教育,也许算得上是一种地缘政治学教育,但是,且不谈相当粗陋,它实际上并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历史视野。<sup>①</sup>如今通过叙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铺展出一幅让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交融的历史地图,毕竟,“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sup>②</sup>

然而“中西交通史”并不具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帝国兴衰密不可分:无论陆上还是海上的贸易通道,无不受帝国秩序掌控。何况,“‘丝绸之路’根本不是什么道路,[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双方的军队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无法发动进攻”。<sup>③</sup>因此,叙述“丝绸之路”的历史若不能深度反映帝国间冲突的历史,难免流于商贾之谈。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政治学家一方面把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成替德意志第三帝国服务的“侵略性学科”或“伪科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学教育以及传媒对国民普及地缘政治学知识。直到今天,美国知识界正是凭靠海上强国的地缘政治观纵论国际政治时局,才掌握着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话语支配权。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学界对世界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迄今

---

<sup>①</sup> 比较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工人理论组/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73级工农兵学员编,《三个世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

<sup>②</sup> 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sup>③</sup> 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36。

仍然相当局促,这与我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有关。为了改变这一情形,本工作坊开设了系列,聚焦于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文献,原典和研究性著作并重,为我国学界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进一步开阔眼界尽绵薄之力。

刘小枫

2018年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 中译本导言

刘小枫

2002年,豪斯霍弗(1869—1946)将军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于1925年(1927年和1938年两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何会突然想起这本书并将它译成英文?

如果我们记得,据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曾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提供过战略指导,并因此而曾被美国政治学家视为“伪科学”,那么,这事就更让人觉得蹊跷。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坦布斯教授为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让笔者的感觉从蹊跷变为惊讶:他毫不掩饰地说,翻译此书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据说,如果中国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陆地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海洋国家”,那么,麦金德(1861—1947)早就预示过的“海洋国家的噩梦”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将何去何从?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还是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的海洋——太平洋?<sup>①</sup>

---

<sup>①</sup> 坦布斯,《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2002),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

麦金德的确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但他预言过中国的“崛起”及其威胁?

### 美国政治人何时开始把中国视为眼中钉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他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据说在美国是权威的大学教科书(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这位研究中东地缘政治的专家在书中对美国学生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看成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因为,

一种控制了枢纽地带的欧亚大陆陆上力量(不管是俄国、德国或者中国,特别是前两者的联盟)将取得对海洋世界的优势。<sup>①</sup>

所谓“或者中国”并非麦金德的说法,而是科恩因应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纪初的欧洲大战(1914—1919)结束之际,为了构建世界“和平”秩序,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1919)。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但麦金德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仅仅一带而过地写道: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个国家很复杂,治理虽良好,却长

---

178,亦见页174、177。比较吉原恒淑、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2010),钟飞腾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sup>①</sup> 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2009),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2017,页16。比较S. B.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期处于“呆滞状态”。<sup>①</sup>

1943年7月,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态势已经出现逆转,但中国战场仍然前景黯淡,日军即将针对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开“秋季大扫荡”,而针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战略轰炸已持续了长达5年半之久。这时,麦金德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脏地带”概念的政治地理学含义,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单位。他同样仅仅一带而过地说:一旦海上强国驯服德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位于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的“古老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sup>②</sup>至于中国和印度走向繁荣之后是否会对海上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遑论“最大威胁”,麦金德未置一词。凡此表明,麦金德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好中国。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1943)出版了四百多页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因应1930年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变局为美国提供战略应对方案。该书为美国在战后的地缘扩张和打造“美国和平”提供了政治学依据,摩根索(1904—1980)大名鼎鼎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显得不过是其续篇。<sup>③</sup>

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到了应该崛起并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时候了。通过继承并修改麦金德的理论,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

①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20。

② 麦金德,《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摘译),见麦金德,《图解大国陆权》,何黎萍编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页212。

③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6/2012。

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学转换为美利坚帝国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在这本大著中,中国成了美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最大威胁”,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书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经“控制了远东沿海地区”。<sup>①</sup>看来,斯皮克曼的这部大著收笔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德国也尚未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需普及地缘政治学教育,以动员民众投入战争。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一次题为“和平地理学”的演讲,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症病逝,享年50岁。美国的政治人无不为这位政治学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当然,他们也感到庆幸,斯皮克曼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即为美国在战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战略性指导。

### “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依据斯皮克曼的临终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学》(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标题中的“和平”这个语词相当引人注目。在我们的常识意识中,“和平”让人产生盼望甚至激发美丽的想象。因此,我们会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学》通过普及政治地理学知识主要讲战争,以及美国在战后应该如何凭靠军事优势遏制欧亚陆地上的政治体势力,凡此与“和平秩序”有什么相干?难道“和

---

<sup>①</sup> 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王姗、郭鑫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425(以下简称《美国战略》,随文注页码)。

平秩序”的含义是凭靠军事优势遏制其他政治体？无论如何，斯皮克曼最终获得了 *godfather of containment* [遏制(战略)教父] 的美誉。

看来，除非我们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欧洲式的国际政治史，否则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实际含义。

“罗马和平” (*pax romana*) 这个历史语词非常著名，指凭靠强势权力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说法，“罗马和平”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这听起来似乎是说，“罗马和平”指单一政治体内的“国内和平” (*civil peace*)，即克制政治体自身内部的内乱或内战状态而建立的强制秩序，其实不然。罗马帝国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它凭靠不断征服周边的诸多政治单位而成为一个疆域日益扩大的政治体。因此，“罗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边远地区的广阔空间，这是群雄竞逐的场域”。在罗马人眼中，*orbis terrarum* [地球] 是一个权力场域，“群雄的政略”无不受这个广袤地理空间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要成功克制碎片化的地缘政治势力，就得凭靠 *imperium* [帝国/权力] 本身，否则“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sup>①</sup>

由此看来，“罗马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帝国和平” (*imperial peace*):

犹太战争提醒我们罗马帝国和平的不稳定性；被征服的民族并没有被完全解除武装，罗马保护下的古老制度和主权国，

---

<sup>①</sup>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基督教》，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53。

被帝国秩序覆盖,然而却未被清除。换言之,只有以前独立的政治单元的记忆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带内的个体感到自己不是团结在传统的或者局部的共同体内,而是团结在征服国内,帝国和平才能变成国内和平。<sup>①</sup>

显然,罗马共和国的“和平”与罗马帝国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罗马共和国已经充分显露出自己具有帝国扩张的欲望,它使得这个城邦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随后就开始征服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罗马帝国不得不扩大罗马公民权,以便转化“和平”秩序的性质。

“罗马和平”遇到的麻烦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都会屈服于罗马帝国的“和平”。“罗马和平”出现之前,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种“帝国和平”,但没有成功。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国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与罗马势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夺亚美尼亚控制权的战争,帕提亚帝国最终迫使罗马帝国签订了一个划界而治的“和平”条约(公元63年)。

这时,地球上出现了三个并存的帝国式“和平秩序”。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帕提亚的“和平秩序”和罗马的“和平秩序”先后土崩,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外,从地中海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新的“帝国秩序”此消彼长、相互厮杀。

基督教欧洲的“帝国秩序”最为奇葩,因为这个帝国的内部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反倒经历了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厮杀,

---

<sup>①</sup> 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页147(以下简称《和平与战争》,随文注页码)。

最后干脆形成了一种以帝国内部的“国际”战争为常态的“和平秩序”。基督教共同体之间的战争状态就是“和平状态”，战争“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类，这种国际间的“和平”样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与战争》，页148）。

“和平”作为政治秩序离不了基于铁血的强权，但秩序本身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和平”与“正义”（*pax et justitia*）往往连属。可是，何谓“正义”的秩序以及何谓“正义”的战争，从古至今都让人大伤脑筋。何况，单一政治体内部的正义与政治体之间的“国际”正义还不是一回事儿。基督教欧洲这样的政治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很难区分“国内和平”与“帝国和平”，一旦遇到这样的政治史现象，人们就对思考“和平”秩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感到绝望，这完全可以理解。

### 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非道德”传统

阿隆的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长达700多页，仅在附带情形下提到过一次“正义”这个概念（《和平与战争》，页16）。对阿隆以及绝大多数欧洲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讨论国际政治问题不得不采取“非道德”立场，即凭靠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来思考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这样做的理由既简单又明了：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义”，但“17世纪撕裂欧洲的宗教冲突”迫使西欧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弃对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产生了以《利维坦》和《神学政治论》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和平与战争》，页1）。这意味着，政治体中的人们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诉求，政治冲突不仅会因此而无休无止，还会变得日愈残酷，不